

Intergenerational Order: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Social Distance Differences of New Media Use among the Elderly

Li Li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ptualizes social d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s a social judgment, can be adjusted by social distance. People often feel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through the mass media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eople or groups who are more different from themselves, more distant from themselves and more distant from the society, and has a relatively small impact on the people or groups who are similar to themselves, closer to them and less distant from the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distance is framed in two dimensions related to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new media use, trying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dimensions and the group perception stereotype, group identity and media use habits. In Xiaogan City,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conducts a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network incident caused by the dispute between Henan square dancing aunts and teenagers seizing the basketball cour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data of 503 local resid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group's media bias, stigmatized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normative function of the media all contai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media solemnity. These dimensions, together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etiquette order, have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social distance.

Key words: Social distance; Third person effect; Etiquette order; Media use

Received: 2020-10-15; Accepted: 2020-12-14; Published: 2021-01-11

作者简介: 李理,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媒介伦理。

文章引用: 李理. 代际秩序: 老年群体新媒体使用的“第三人效果”及社会距离差异[J]. 中国新闻评论, 2021, 2(1): 36-50.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1004>

代际秩序：老年群体新媒体使用的“第三人效果”及社会距离差异

李 理

提 要：本文对社会距离进行概念化阐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第三人效果作为一种社会判断，可以由社会距离来调节。提供关于这些影响社会距离的信息会影响第三人效果的程度，人们经常会感觉通过大众媒介传达出来的信息对与自身差异性较大、较为疏远、社会距离较大的人或群体影响比较大；对和自身相似的、较为亲近、社会距离小的人或群体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本文将社会距离定义框定在第三人效果与新媒体使用相关的两个纬度中，试图探讨这两个纬度与群体感知定势、群体认同以及媒介使用习惯之间的理论关系。本文在湖北省孝感市对“河南广场舞大妈与青少年抢夺篮球场发生争执所引发的网络事件”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对503个当地居民面访资料的分析结果发现，群体的媒介偏向、污名化负面信息和对媒介规范性功能的都包含多个媒体庄重维度。这些维度与礼仪秩序的消解一起对社会距离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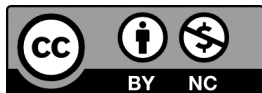
关键词：社会距离；第三人效果；礼仪秩序；媒介使用

收稿日期：2020-10-15；录用日期：2020-12-14；发表日期：2021-01-11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从2006年“扶老人反遭讹的彭宇事件”为典型的网络事件开始，老年群体形象在媒体的报

道下呈现出污名化负面趋势，媒体选择性标签“老人变坏，坏人变老”“倚老卖老”对老年群体产生刻板印象，引发信任危机。同时在后喻文化时代中，年长的人却仍然沉浸在前喻文化的优越感中，年轻人不再对年长的人言听计从、尊顺有加。2017年河南广场舞大妈和篮球少年因为场地问题而大打出手，《球场被广场舞大爷大妈占领，倚老卖老还是以强凌弱》等文经过自媒体发酵扩散传播，迅速引发网络舆论。对2017年6月至12月关于“广场舞大妈和篮球少年争执事件”的话题度分析发现，该话题热度在至2017年9月5日之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从9月5日之后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与此相关的报道评论也呈现出群体极化特点，积极的报道只占到相关报道总数的0.31%，而消极的报道比为19.63%，中性的报道占80.06%，呈现出明显的消极情绪和感情倾向的各类社交媒体的数据（评论、转发数据）显示出对传统尊老的秩序礼仪的质疑。

中国社会变革在促进媒介功能多元化的同时带来了商业化、娱乐化的影响，新媒介技术拓展了资讯传播的互动性也凸显了资讯泛滥的弊端。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很多悠久的传统实践被复制到网络上。以社会距离来解释在城市的特殊环境（篮球操场）中，陌生人群体（例如广场舞大妈群体和篮球少年群体）日常行为以及社会交往模式，勾画了一个异常可感知的“公共”。

二、基于第三人效果的社会距离理论预判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最早创造了“社会距离”的概念，之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分析社会行为诉求时，将其视作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率先为社会距离这一抽象的概念阐述了具体的内涵^①。帕克在齐美尔陌生人思想中得到启发，将社会距离的概念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新的定义，为了两个及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他将这一概念和当时美国种族群族关系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刻的解读，社会距离也由此成为一个用来解释社会问题的重要社会学概念^②。此外，帕克指出这种彼此亲近感的缺乏是可以测量的，之后经由E.博加德斯发展出社会距离量表，使得抽象的社会距离变成了具体可感知的态度判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第三人效果作为一种社会判断，可以由社会距离来调节。提供关于这些影响社会距离的信息会影响第三人效果的程度，具体而言，人们经常会产生一种感觉，即大众媒介所报道的信息对和自己社会距离较大的、差异性较大、较为疏远的人或群体影响较大，而对和自身社会距离较小的、相似的、差异性小的，较为亲近的人或群体影响相对较小。

第三人效果理论是一个关于阐释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社会认知理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

① 齐美尔. 货币哲学[M]. 陈戎女,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387.

② 帕克在对于种族关系的分析中使用了“社会距离”概念，他论证说，两个个体之间社会距离越大，相互间的影响就越小（科塞，1977）。

播的影响力的时候往往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感知定势，即更容易认为大众媒介传达给大众的信息（特别是带有宣传意图、充满说服性质以及包含负面化信息）对“我”和“你”（“我们”和“你们”）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他们”）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①。第三人效果的逻辑是在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驱动下，放大了媒体传递的信息对他人产生的现实影响^②。一是归因理论，即人们能用来证明他人行为的内部过程。行为者会把他们表现出的行为归结于当时的情景需要，然而观察者倾向于认为行为者表现出来的举动代表着稳定的个人性格，这是一个大众普遍的看法^③。乐观主义偏向是第二个主要的心理机制。出于自尊和社交愿望以及其他因素，人们更倾向于将任何对自己有害的或是负面的媒介暴露的信息影响最小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偏向的乐观主义”或是对自己的盲目乐观，被看作和媒介影响广泛的负面效果有关。媒介的负面影响在被认为对自己和他人之间作用的程度不同^④。研究表明，在第三人效果存在的同时，也往往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当媒介影响被认为是积极的时候，大众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些正面信息的影响可能要大过他人受到媒介积极信息的影响，人们出现的这种与第三人效果截然不同的心理判断，可看作为第一人效果，也可以视为反转的第三人效果，它们都反映了公众评判大众传播对不同群体的不同效果。Brosius 和 Engel（1996）认为第三人效果的范围同样根植于间接信息的客观影响^⑤。换言之，只要是一定意义上的“第三人”和“第一人”彼此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很大，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三人效果的影响程度也同样会很大。归因理论和乐观主义偏向或对自己的盲目乐观理论都描绘了第三人效果背后的运行机制和原则。

社会距离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不同群体使用不同的媒介，而是在于如何积极地批判性的理解和使用媒介。Gunther 和 Hwa（1996）^⑥认为，亚洲人的自我概念更加一体化，因为亚洲人不倾向于去将别人的看法和自我观念隔离开来。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特点是第三人效果的另一种因素。一种开放的民主文化鼓励自由表达，然而一种压制性的政治体系可能会阻碍这种自由。尽管非西方的自我观点可能减少人们看见他们自己和他人不同的可能性，增加人们对感知他人影响的反应的可能性。美国学者 J.T. 蒂德格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年纪较大的人出现第三人效果的可能性更大，频率更高。他们认为，年龄的增长意味着信息接收的类型和渠道更多样，

① 戴维森. 传播中第三人效应的作用 [J]. 舆论学季刊, 1983.

② Paul B, Salwen M B, Dupagne M.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 meta-analysis of the perceptual hypothesis [J].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0, 3 (1): 57-85.

③ Jones E E, Nisbet R E. The actor and the observer: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behavior [M]. In Jones E, Nisbett R E, Valins S, et al (Eds.). At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2.

④ Brosius H B, Engel D. The causes of third-person effect: Unrealistic optimism, impersonal impact, or generalize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media influ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inion Research, 1996, 8: 142-162.

⑤ Gunther A C, Hwa A P. Public perceptions of television influence and opinions about censorship in Singapo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96, 8: 248-265.

年长者会认为在日积月累的经验下，自己更懂得如何判断媒介所传达给公众的信息，以及信息中包含的说服意图会对自身免疫并对其他群体产生影响^①。当媒介传达给公众的内容与自己预设立场存在差异时，会高估对他人的影响，与自己看法相似时，往往出现第一人效果。四是自我相关度，当与媒介阐述的问题关联度越高，相比于对自身的影响，大众往往会容易认为他人会受更大影响。五是专业相关度，媒介涉及自己熟悉的领域时，容易产生第三人效果。此外，Price, Huang 和 Tewksbury (1998) 研究了第三人效果与个人媒体取向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调查是建立在一个既定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之上阐明观众的媒体导向，比如信息寻求行为和动机。基于第三人效果文献分析，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关注传统媒体的媒介内容而非媒介情境，在信息技术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背景下，媒介形态多种多样，传统媒体渠道发布的信息，其第三人感知效果的程度要大于互联网媒体渠道；传统媒介中的第三人效果依然存在于新媒体传播中，且两者依旧正相关，但其具体效果和关系受到充沛信息及其他变量的影响而变化^②。目前集中在社交网络中的第三人感知效果研究，以及感知的后续行为。且大部分以国外的政治动态作为第三人效应的研究基础，就政治议题层面传统媒体上的攻击广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互联网信息的影响^③。所得出结论的可推广的空间及领域狭窄。本文将在新媒体使用层面考察社会事件类第三人效果的社会距离，并且社会距离与群体感知定势、群体认同、群体感知差异以及媒介使用习惯之间的理论关系以及形成机制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群体的媒介偏向、污名化负面信息和对媒介规范性功能的都包含多个维度。本文将深入考察这些维度与礼仪秩序的消解、对传统孝道精神冲击一起对社会距离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大问题：（1）考察新媒体使用的第三人效果对社会距离有何影响？前文所述以往研究发现，从三个具体模式：媒体劝说力量的信念，新闻中偏见的信念，观众对于劝说媒介影响脆弱的信念，解释更广泛意义上的第三人效果，大众是如何过高估计媒介传达的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而同时忽略对自身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一：新媒体使用显著影响可感知的预测因素。如果新媒体使用的第三人效果存在社会距离，那么为何会存在这种影响，是否存在边界条件，使得不同条件下，社会距离的差距不同？且不同社会距离在新媒体使用对环境的监测和感知中起到何种作用？这是本文将讨论的重点问题。

① Tiedge J T, Silverblatt A, Havice M J, et al. Discrepancy between Perceived First-Person and Perceived Third-Person Mass Media Effects [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91, 68.

② Li X. Third - Person Effect, Optimistic Bias, and Sufficiency Resource in Internet Use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8, 58 (3): 568-587.

③ Wei R, Lo V H, Lu H Y. The third-person effect of tainted food product recall news: Examining the role of credibility, attention, and elabor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0, 87 (3-4): 598-614.

(2) 探讨新媒体使用下社会距离的形成机制,即第三人是谁,哪些因素造成了传播中的第三人?在青少年群体(篮球少年)看来,老年群体(广场舞大妈)就是第三人。同理,以老年群体的视角来看,青少年群体就是第三人。不同群体产生的第三人认知并非表面呈现出的年龄或性别不同,而是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培养出的知识体系、思维判断、情感认知与“我们”的差异较大,社会距离较远,因此,“他们”就是“我们”眼中易相信媒介传达内容,受媒介观念影响的第三人。正式由于差异的存在,才会产生意义,由于群体不同,才会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即第三人出现。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媒体使用面向的是“受众的差异”,叙事方式普遍更为激进、猎奇、冲突,而在新媒体逐渐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驻大众的生活,占据公众的视野,社交关系中群体成员内部的一致性和不同群体的异质性以及跨群体间的交错性带来传播语境复杂性和传播效果认知的模糊性,由此双重叠加效应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作为“我们”,产生了与我们差异性大,形成强烈比照的“第三人”,第三人既可以指个人,也可指群体。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新媒体使用的依赖性显著正向影响同群效应,同群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距离,即同群效应作为中介因素,在新媒体使用对群体传播影响中产生效果。

(3) 探讨新媒体使用下第三人效果的社会距离的边界条件。美国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曾指出,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是完美的公共人,与陌生人相处的经验不仅对个人人格形成至关重要,也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动力所在。由于陌生人的存在,城市会出现取信于陌生人的规则,一旦这些内容具备连贯性的规则形成系统,一个公共领域就形成了。以往研究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方面提供了社会距离如何产生影响的研究视角^①。由于现代媒体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强大优势,相比于以往,它容易携带,便于操作的特征使得它快速充分渗透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现代媒介也渐渐成为现代城市的一种表征,现代城市主义与之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改变了经验与地点、陌生与熟悉、他人和自我之间的纽带,公共领域也发生着改变。个人和个人、个人和群体、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媒介无形或有形中所赋予大众的社会认知而发生改变,以移动互联网媒介所形成的新的关联空间开放性影响着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在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情境和道德规范下,本文提出假设三:媒介素养在第三人效果的社会距离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媒介和现实的混淆程度正向影响社会距离的拉大(假设三a),而媒介偏见判断正向影响社会距离的拉大(假设三b)。

三、礼仪秩序：案例情境

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遵循礼仪规范是亘古不变的定律。先秦时期,重视天道,重视秩序。

^① [美]理查德·桑内特. 公共人的衰落[M]. 李继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9,27.

《易》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所有错。”^①这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道德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不合秩序的，都不能为道德。在尊重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了家长制度的形成。中国情境中定义社会距离受到传统社会尊老爱幼和长幼有序的道德伦理的延续影响。

孔子认为要用孝统摄言行，孝的最低要求是赡养孝顺父母，中间要求是侍候服从国君，最终目标是能够修身立命，达到立身扬名的高度。孟子主张的性善说大体上归纳了四种社会道德规范：仁、义、礼、智，具体而言父母和子女之间存有亲情，君王和臣子之间应有仁义，夫妻之间要有分别，年纪大者和年纪小者之间存在次序，朋友相处之中充满信任，勾勒了一个以孝义为秩序的社会。墨家的“兼爱”思想，提倡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平等爱所有人。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②中包含了从尊敬爱护自己的父母小孩延伸到全社会的老人孩子，其中推己及人“大孝”思想深入人心。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思想都透露出孝义的主张，包含着尊老爱幼的思想。其中，以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儒学经典《孝经》最为典型。《孝经·开宗明义章》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③指出了孝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爱护自己，第二层是尽心侍奉君主，第三层是孝的最高目标，达到修身立德、扬名后世的境界。由于《孝经》中提倡“事君”，所以广泛地被统治者宣传利用，孝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规范和生活的风尚。

汉唐时期儒学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西汉成书的《礼记》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④，寄托了儒学家对博爱思想和大同社会的向往。“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⑤这段话认为要以为人要博爱，做事要恰到好处当作日常行为的准绳，符合“道”的要求，从而走向一个圆满的道德高度。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为人们建立的内心标杆和行动的标尺，是人生的价值追求。宋明理学时期，朱熹等人都强调注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上许多有名望的大家族都制定了自己的家族规范，其中以享有“江南第一家”美誉的郑氏家族最为典型，郑氏家族拥有一套包含为人处事《郑氏规范》规定，子女必须侍奉父母，妻子要尊重丈夫，兄弟手足之间要互相爱护，邻居有困难的时候，应当及时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46．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58．

④ 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331．

⑤ 韩愈．韩昌黎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3．

帮助，并且不得收取好处。这些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孝、义的重视，体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重视孝义的观点，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追求的博爱而达到大同的理想社会，明朝也是大力提倡儒教思想，推崇孝治，朱元璋曾颁布《圣谕六条》：孝顺父母，尊重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守生理，勿作非为。这体现了明朝强调家庭秩序，尊孝道，行孝行，以此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前代相比，明朝关于《孝经》的教育更为广泛，女子也包括其中，如此一来促进了所有社会成员对于孝道的认知，使得整个社会环境形成了知孝、懂孝、尊孝、行孝之风。清朝也十分重视孝文化的传播，康熙的《圣谕十六条》要求百姓孝亲睦族、勤俭节用、隆师重道、重农务本、讲法明礼、完粮纳税。雍正在这《圣谕十六条》的基础上颁布的《圣谕广训》成为清代中后期宣传、推行孝道的主要文本。

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鲁迅等人主张的改造国民性成为工作重点，而我国国民性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其中传统的孝义文化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忠君的思想与国民的软弱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抨击留存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孝道思想是学界的主要观点。而五四运动对于孝文化的批判存在偏激和偏见，对孝文化展开的批判性观点，主要集中在提出口号的浅层次上，指出应该破除旧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而对于真正影响精神的忠、仁、孝、义等问题几乎没有具体言论主张和行动方针，故批判带有片面性^①。陈独秀认为，孝文化应该大刀阔斧地剔除，“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②。在陈独秀等一批思想家看来，传统的孝文化与当时的社会水火不容，在政治层面对孝文化声讨，在思想上充满偏激性和攻击性的谴责，孝文化一直处于猛烈地批判之中，致使其中的一些优秀精神文明流失，内容发展上出现断层，这是我国孝文化发展中出现较大的一次震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提倡尊老爱幼并将其写入法律。此后孝从社会风尚进一步发展为法律规范。1956年《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第47条规定暴力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或者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将尊老爱幼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之后，人人必须遵守，促进全社会内孝文化推广。但1957年开始我国政治上“左”倾错误开始并不断发展，孝遭遇到批判。孝被看作封建社会的落后产物，具有阶级性，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的运动使得当时社会对“孝”都是批判的态度，甚至传统社会尊崇的孝道变成人们耻于提及的行为，这是对孝文化发展最大的一次冲击。1979年后中国共产党系统的清理了左倾错误，实行

① 韦政通. 儒学与现代社会 [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0: 41.

② 陈独秀. 独秀文存 [M]. 合肥: 合肥出版社, 1987: 697.

拨乱反正，对于传统的孝义文化也不再“一刀切”，采取了辩证的态度，提取能够反映当下我国精神风貌的孝义元素并与新时代思潮相融合，剔除“愚忠”“愚孝”的封建残余，反对片面地否定，传统的孝文化渐渐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复苏中不断发展。

四、研究方法 with 结果

（一）研究地点

本次研究选择湖北省孝感市来检验我们的假设。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由：首先基于孝文化的大背景，孝感城市的得名和董永孝行感天动地是分不开的，它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孝”进行命名的城市，也是我国的“孝文化”之都，孝文化底蕴深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二十四孝子之中的三孝，孟宗“哭竹生笋”、黄香“扇枕温衾”、董永“卖身葬父”都出现在这个地方，尊老爱幼具有历史优势和代表性。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地尊老爱幼思想深入人心。

其次，孝感市在地理位置上地处湖北省中北部，与河南省接壤。“河南广场舞大妈与青少年抢夺篮球场发生争执所引发的网络事件”发生地正是在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与事发地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孝感市本地广场舞发展迅速，目前以“孝感东站广场”为代表的公共活动区域广场舞群体随处可见。孝感市民由于地缘接近性和心理接近性，我们在前期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当地的老人还是青年，对于该网络事件有一定的关注，或多或少听说过该网络事件，这也使得我们得以收集对该网络事件的调查问卷。

最后，该项研究是一项有关移动圈群互动机制项目研究的起始部分，希望以孝感这块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试验田来检验理论假说并作为基准点，未来将扩大研究地点，选取具有其他不同特征的城市调查，将孝感与其他城市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比较考察与研究。

（二）抽样

文中所得数据来自 2017 年 10 月在湖北省孝感市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对该市 503 名 14—35 岁青年市民组成的随机样本进行了入户面访调查，采用多层集群抽样进行调查（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首先从孝感市人口统计局获得资料，资料上显示了目前孝感市行政区划，具体包括孝南区、市郊新区 2 区，以及孝昌、大悟、云梦 3 县，同时代管安陆、汉川、应城 3 个县级市，共 461 个居委会。从中随机抽取 50 个居委会，采取系统随机抽样方式抽取 700 家庭，根据“最近生日法”从每户家庭选择一个人为调查者。整体响应率为 71.9%。

（三）测量

本调查研究中大致包含下述几个变量：

1. 社会人口学变量

这一维度是常规上调查必备的基本要素，包括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标准而规范的“四重奏”变量：被访者的性别、年纪大小、教育程度、收入情况。

2. 社会距离

看作是拥有着深刻内涵的多维度概念，由实际的地理距离、政治价值的不同、可感知的差异性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性组成^①通过社会距离量表来进行量化，以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的交往意愿来表现，是五个问题合成的因数（你是否愿意定期去敬老院？你是否会愿意和老年人成为邻居？你是否愿意和老人一起旅行、参加体育运动或是学习交流？你是否愿意和老年人生活在一起？你是否会愿意和老年人成为经常交谈的朋友？用1-5表示，愿意程度依次降低）。信度系数=0.872。

3. 媒介使用

由四组问题组成，检测媒介使用习惯的不同侧面。在媒介使用上对新闻关注程度的问题是：使用新闻客户端的频率、对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关注了解程度、对社会新闻的关注了解度（用1到5的五级量表进行测量，5表示非常高）。通过媒介使用方式（使用手机是竖屏多还是横屏多；竖屏多记为1，横屏多记为0；来推测媒介使用意图（社交、获取信息或打游戏、看视频）。信度系数=0.63。

4. 同群效应

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基于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媒介使用的同群效应问题是：你会因为朋友（朋友圈）推荐而专门看某条新闻、你会因为熟人关系而专门去关注或是搜索某条新闻。二是测量同辈群体的同群效应，同辈群体采用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进行问题设置，分别是您的朋友是否愿意关注老年群体的信息？您的同学或同事愿意关注老年群体的信息？您的同龄人愿意关注老年群体的信息吗？并在此基础上设置问题：您认为您的朋友、同学同事、同龄人的看法会影响到您对老年人的交往接触吗？五组问题相结合，探讨了基于媒介使用的同群效应的大小以及青年群体自身对于同群效应的认知程度。测量方式上同，信度系数=0.772。

5. 媒介活跃度

由三组问题组成，逐层深入。看到一致的观点时，是否会点赞；看到感兴趣的文章时，是否会转发；是否会参与网上热点话题的评论，测量方式上同；信度系数=0.622，反映媒介使用的活跃程度和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参与程度。

^① Paek H J, Pan Z, Sun Y, et al.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s social judgment: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 distance and uncertainty in perceived effects of political attack ad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5, 32: 161.

6. 媒介素养

保留了四个次级维度：媒介呈现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之间的混淆代表一种非批判的解读，由三个不同侧面的问题构成：新媒体上报道上的负面老人形象就代表了现实生活中老人群体形象吗？新媒体报道内容是全部的事实吗？朋友圈的消息就是真实的消息是基本真实并可以转发的吗？媒体报道的看法代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看法吗？均用1到5的五级量表进行测量，5表示不赞同，1表示十分赞同；信度系数 $\alpha=0.889$ 。新媒体生产知媒介偏见判断由对媒介看法这一问题测量，是否存在没有偏见、没有偏向的媒介；价值追求，通过媒介选择的倾向这一问题构成，是否同意新闻的情感性比真实性更重要。

我们基于“普通最小平方多项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 Multiple Regressions)进行统计分析，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后，将每一组变量媒介使用、同群效应、媒介活跃度、媒介素养、性别轮流作为因变量加以分析。在保证研究科学性和易操作性的同时，研究没有再控制其他变量。

（四）资料分析结果

1. 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因变量				
社会距离	12.8290	3.97535	5	25
自变量				
性别	0.5288	0.49967	0	1
媒介使用	12.1392	2.46176	4	16
新闻关注度	11.3400	2.41297	3	15
国内外新闻	3.6143	0.87595	1	5
社会新闻	3.8191	0.79407	1	5
阅读新闻频率	3.9066	1.28010	1	5
同群效应	12.1392	2.46176	5	25
基于准社会关系下媒介使用的同群效应	16.9145	3.23308	1	5
媒介活跃度	10.2227	2.57751	3	15
评论	2.7495	1.16424	1	5
转发	3.3837	1.22957	1	5
点赞	4.0895	1.01087	1	5
媒介素养	12.3579	4.06118	4	22
媒介内容和现实的混淆	11.0119	3.77239	4	20
偏见判断	0.5765	0.49460	0.00	1.00
价值追求	0.7694	0.42165	0.00	1.00

注：1. 性别中0表示男，1表示女；2. 合并社会距离每题前两项（分值为1，2）为社会距离小（总分5-10），每题后三项（分值3，4，5）为有社会距离（总分10-25）。

2. logistic 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预测社会距离影响因素

Table 2 Predict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distance

自变量	社会距离
人口学变量	
性别	-0.136**
R^2 (%)	18
媒介使用	-0.229**
新闻关注度	-0.217**
媒介使用方式	-0.9
R^2 (%)	5.2
同群效应	-0.523**
基于媒介使用的同群效应	-0.196**
同辈群体	-0.541**
R^2 (%)	27.7
媒介活跃度	-0.251**
R^2 (%)	6.6
媒介素养	0.152**
媒介内容与现实的混淆	0.139**
偏见判断	0.114*
价值追求	0.045
R^2 (%)	2.2

注：* $p < 0.05$ ，** $p < 0.001$ ，样本数 = 503。

我们将人口统计学上的四个变量中的三个：年龄、收入程度、学历进行控制之后，性别与因变量社会距离的关系较为突出，呈现显著相关。新闻关注度和媒介使用方式呈现负向相关性。新媒体使用显著影响可感知的预测因素。验证了假设一，即在不同的社会距离对环境监测和感知中起到高估媒介负面影响的作用。同群效应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移动新媒体使用引起更具差异的、更加细分的群体，同辈群体更多的产生可供与“我们”形成强烈比照的“第三人”——他们群体，验证了假设二。媒介素养的关联性最弱，相关系数比较小，处于显著与非显著的边缘地带。媒介素养在第三人效果的社会距离中起到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三，具体而言，对媒介和现实的混淆程度正向影响社会距离的拉大（假设三 a），媒介偏见判断正向影响社会距离的拉大（假设三 b），而媒介价值追求对社会距离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与结语

该分析架构的基点是对于社会距离的定义和影响因素的测量，更多地基于新媒体的测量来进行，反映了新媒体使用的第三人效果的社会距离影响。由表2可见，在控制年龄大小、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与因变量社会距离的关系较为突出，

呈现显著相关。即青少年男性较之于女性，与老年群体的社会距离较大。当该事件中面对冲动易怒的小伙子，退休老年人还是底气不足，小伙子尝试以暴制暴的拳脚相向，给了老年人抢占道德舆论制高点和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镜头曝光底气，也给了管理者“不近人情，不合道理”的道德层面的压力。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涵盖了对新闻的关注度和使用方式两个维度，其中媒介使用方式与社会距离几乎不相关。随着智能终端发展普及，根据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高达97.5%，在这样的使用格局下，手机成为大众最青睐的媒介，渐渐以手机为中心，扩散至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的智能设备，随时随地沟通大众和媒介信息，将大众和外界紧密相连，成为了“万物互联”的基础，用户形成了通过移动设备端接触网络的媒介使用习惯已经养成^①。但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碎片化的使用习惯令短视频的触网体验引发追捧热潮，当下种类繁多的短视频拥有着各自不同定位和受众诉求的差异，所以在表现形式上短视频可以分为横屏模式/竖屏模式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画面呈现。该事件中，王城公园内跳着广场舞老年人和打篮球的小伙子们由于篮球场使用权问题而发生矛盾，场面从最初言语争吵上升到肢体冲突直至陷入混乱，视频中呈现了激烈的画面，原生态内容通过新浪微博官方视频应用迅速上传引爆流量。秒拍提供的竖屏观看方式更符合当下碎片化阅读环境的浏览习惯，使用方便，内容诉求也更加强调片段冲突和断章取义的情绪表达。新闻关注度与社会距离呈现出很强的负向关系（ $\beta = -0.25$ ， $p = 0.001$ ），其中以社会新闻的关注度影响最为显著（ $\beta = -0.946$ ， $p = 0.005$ ）。结果发现，越是对社会新闻关注程度高的青少年，反而有意愿更为全面包容老年群体，第三人效果不显著。使用方式准时准点，人员众多的群体特征，使用目的健康积极，道德高地的年龄优势，上述所有因素都使得公共场所成为心照不宣的跳舞场地和老年群体默认既有的自身利益。在该事件评论中网友为广场舞大妈撰文“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场”，感叹这项随处可见、日益壮大的集体活动的顽强生命力^②。

基于准社会关系和同辈群体两个维度下的同群效应，社会距离表现出与这二者较强的负向相关。同辈群体都有社会距离标准来区分“我们”和“他们”。广场舞老人群体以“人多力量大”的现实逻辑和“尊老爱老”的传统习俗集结成群：人多气势大，人多就有理，加之全是毋庸置疑的长辈，在当今社会环境中没人敢去打老人；在倚老卖老的心理下，年轻人挑衅篮球场空间的行为就是异质的“他们”。篮球青少年群体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空

① 新浪网. CNNIC 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统计报告 [EB/OL]. (2018-01-31).

<http://tech.sina.com.cn/ztd/cnnicreport41/html>.

② 谢地蓬. 如何看待广场舞大爷大妈与篮球少年发生肢体冲突? [EB/OL]. (2017-06-0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544352html>.

间逻辑集结成群：社交网络将人际关系作为提供个性化信息的主要依据，打造了基于社交关系的庞大准社会关系平台；篮球场不是跳舞的地，广场舞老年人占用篮球场甚至是高速公路、巴黎卢浮宫广场跳舞的行为就是异质的“他们”。但是这些群体规范性的区别，即使被集体承认，也并不总是与团体成员的情感取向一致。一群正常亲密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热情友好的，而正常的疏远的群体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尊敬和爱的对象。可以感知到正常的远距离群体——作为抢占公共空间的竞争者，倾向于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并触发不同的情感取向，激发群体的媒介偏向、污名化负面信息和对媒介规范性功能对社会距离不同维度之间关系。人际关系只是现实世界中最显性的社会资源之一，人际关系的信息化只是现实与网络空间互嵌的开始。

媒介活跃度一组三个问题，评论、转发、点赞依次反映了活跃程度的高低，与社会距离呈显著关系（ $\beta = -0.279$, $p < 0.001$ ）。由表1可知，在受访的青年群体中，媒介活跃程度分布存在偏差（ $\bar{x} = 2.7495$ ），网络表达行为集中在转发、点赞这类间接的方式（ $\bar{x} = 3.3837$, $\bar{x} = 4.0895$ ），而直接的评论相较较少（ $\bar{x} = 2.7495$ ）。相比深度的参与表达的评论，网络行为更多地倾向于浅层关注不表明态度的转发、点赞，未能形成或是不愿意进行完整的意见表达。社交关系接入互联网，线下人际关系在网上不仅表现为端对端的关系网络，线下人际关系更深地接入互联网，网络空间越来越具备现实性，即用户的某些真实特征映射到网络空间。王城公园事件迄今为止，仅仅从用于广场舞的场地和时间，以及音响的外放音量等方面为其划定了相应的标准和范围，以“扰民”为名简化事态的处理结果是紧紧封闭了篮球场大门，并未解决双方的矛盾，这也加剧了现实的篮球少年和广场舞老人群体间隔阂，并投射到网络空间，形成一边倒的舆论，纷纷指责广场舞老年群体，称他们为“公交车上林黛玉，篮球场上方世玉”^①。

表2显示了社会距离和媒介素养技能三个维度的关系，媒介素养在本模型建构中影响因素相对较小。媒介内容与现实的混淆（ $\beta = 0.074$, $p = 0.001$ ）、媒介偏见判断（ $\beta = 0.367$, $p = 0.001$ ）与社会距离表现为正向关系。越容易将现实和媒介内容混淆的青年，越容易相信一些媒介带有偏见性的报道，树立或是加深与老人群体的社会距离隔阂。而媒介的价值追求似乎与社会距离风马牛不相及。在孝感孝文化传统地域特色的文化背景和情景特异性下，当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孝文化的推广普及，对孝人孝行的歌颂弘扬力度大，长期耳濡目染下尊老的礼仪秩序涵养随之提升。如果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那么，民族精

① 庄里的外地人，公交车上林黛玉，篮球场上方世玉，致那些斗争在篮球场的大爷大妈们！[EB/OL]. (2017-06-03).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69147959659502&whtml>.

神不屈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善谐和”^①。传统社会中蕴含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的精神历久弥新，与时俱进，个人的心理感受与社会的道德规范融合发展，呈现生生不息的状态。但是现代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人们陷入了一种“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漩涡”^②，在疯狂的漩涡下心灵的失落中丧失了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在自我意识的主导下丧失了与他人感同身受的共情感，丧失了人类真正的智能——温良。移动互联网的极具扩张促使网络空间成为民众情绪发泄与话语表达的主要阵地，以利益诉求为驱动，情绪表达为手段，网络空间的“情绪共同体”形成的“中国式怨怼”更加拉大价值观差异的群体之间的距离。

当今的自媒体传播首先是一个自我赋权、自我成长的进程，新媒体的作用背后是社会的成长。在自媒体的生产和消费中，个体显示出不同的偏好，反映出社会的不同维度，表面上推崇个性、自说自话的自媒体时代，事实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对话沟通渠道和话语方式。互联网技术的包容性是其固有属性，旨在营造小圈子、寻找个体归属感的自媒体更加强调异质化的内容表达。与哲学和社会学作为社区对立面的“个体”概念不同，从媒介研究领域入手探讨的个体指向媒介终端使用者。网络空间场域的公共性建设既不能仅仅依赖现实空间里，有限地域中有限成员的面对面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也不能再完全通过传统意义上群体成员绝对一致的共同目标、集体情感、归属心理来培育公众对于公共群体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相反，基于个体的兴趣取向和利益追求、移动圈群之间的社交关系的连接以及将现实环境与网络空间照应，才能早日实现理想中的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中公共性。

①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M].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3-34.

② 周国平. 精神生活的哲学 [J]. 读书, 1998 (1): 8-9.